

诸子经典散论

黄寅 著



中国言实出版社

诸子经典散论

黄寅 著

中国言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诸子经典散论 / 黄寅著. —北京: 中国言实出版社, 2007. 2

(中华学人文稿)

ISBN 7-80128-842-4

I. 诸…

II. 黄…

III. 先秦哲学—研究

IV. B2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23247 号

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

邮 编 100101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山东旅科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7 年 2 月第 1 版

200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3

字 数 350 千字

印 数 1000 册

书 号 ISBN 7-80128-842-4

定 价 26.80 元

目 录

导 论 诸子经典文化的智慧与现代意义·····	(1)
一、诸子百家与经典的诞生·····	(1)
二、传统经典文化的基本思想·····	(5)
三、诸子经典智慧的现代发掘·····	(11)
第一章 论《周易》·····	(16)
一、《周易》的义理·····	(16)
二、《周易》的智慧·····	(25)
第二章 论《论语》和《孟子》·····	(37)
一、孔子其人《论语》其书·····	(37)
二、《孟子》其书及其现代意义·····	(50)
三、《孟子》的德性理论·····	(59)
四、以《论语》《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智慧·····	(69)
第三章 论《老子》和《庄子》·····	(122)
一、《老子》哲学思想概述·····	(122)
二、《老子》人生智慧论·····	(140)
三、《庄子》其书及现代意义·····	(145)
四、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智慧·····	(151)
第四章 论《金刚经》和《坛经》·····	(231)
一、《金刚经》的基本教义·····	(231)

二、《坛经》的基本教义	(242)
三、以《金刚经》《坛经》为代表的佛家智慧	(255)
第五章 论《孙子》	(316)
一、《孙子》的基本思想	(316)
二、以《孙子》为代表的兵家智慧	(326)
第六章 论《墨子》	(351)
一、《墨子》的基本思想	(351)
二、《墨子》“兼爱”思想的当代解读	(359)
三、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智慧	(369)
第七章 论《荀子》和《韩非子》	(377)
一、《荀子》的基本思想	(377)
二、《韩非子》的基本思想	(389)
三、以《荀子》和《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智慧	(400)
结束语	(405)
主要参考文献	(409)
后 记	(411)

导 论 诸子经典文化的智慧与现代意义

我们已经远离“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年代。但是只顾在窗外世界打拼的现代人，却常常感叹这是一个精彩与无奈并存的世界。于是，有越来越多的现代人开始阅读经典，认真倾听圣贤且仁且智的教诲，以寻求到变无奈为精彩的人生之道。

——题记

作为四大文明古国，我们伟大的祖国不仅有着 960 万平方公里的锦绣河山，而且有着历史悠久、成就辉煌的传统文化。从 170 万年前的“元谋人”起，我们的祖先就劳动生息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在有文字可考的 4000 多年的漫长岁月里，勤劳智慧的祖先以非凡的创造力，给我们留下了极为丰富的文化遗产。而产生于先秦的诸子经典则是这一文化的最重要形态之一。它不仅对中华民族的历史和现实产生着深刻的影响，而且对世界文化的发展也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因此，了解、学习和研究我国传统经典文化的珍贵遗产，有助于我们了解民族精神的来龙去脉，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从而提升我们民族走向现代化、走向世界、走向未来所应具备的生存境界和人文素养。

一、诸子百家与经典的诞生

中国古代文化在走过了远古的萌生时期之后，至夏、商、周开始进入了真正意义上的发生期。而商代甲骨文的发现则使这一时

期的文化发展第一次有了文字的记载。由于生产水平的落后和认知水平的局限,这一时期的文化是以神为本的,用《礼记·表记》中的话来说就是“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这种神秘的观念曾广泛地见诸于我国古代最早的文字、典籍以及青铜艺术品之中,尤其集中体现在最早的经典——《周易》一书中。

公元前 722 年,周平王被迫东迁。这不仅标志着周天子权威的失落,而且意味着中国历史从此进入了诸侯纷争的春秋战国时代。这是一个“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下》)的时代。然而,就在这充满血火与战乱的动荡时代,中国文化却进入了自己的第一个辉煌时期——百家争鸣时期。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大变革、大动荡不仅为当时的知识分子提供了丰富多样的思想素材,而且也使他们“救世之弊”的社会责任感倍增。这可以说是百家争鸣出现的最重要的文化背景。按照西汉学者刘歆的说法,气象恢宏的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中,最重要的有儒、墨、道、名、法、阴阳、农、纵横、杂、小说等十家。

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他通过对周礼的研究和整理,把带有天道神学色彩的礼转换成伦理道德之礼,而这个礼的核心就是仁。仁的基本含义就是爱人。作为孔子之孙子思的再传弟子的孟子则进一步阐发了孔子的仁学思想,他提出了仁、义、礼、智的四端说,并将儒家学说发展成一套比较完整的“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修身理论。这一理论在先秦就有“显学”之称。在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孔孟之道更是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道统之学。其经典是《论语》和《孟子》。

墨家学派的创始人是墨子。如果说自春秋末年到战国初期是儒家学说广为流行的话,那末,到战国中期就是“孔墨显学”并行天下。墨子出身贫贱,史籍中称其为“贱人”、“鄙人”。从《墨子》一书中看出,他不仅是个思想家,还是个社会活动家。他组织了我国最早的学术社团,加入的人大多是“耕稼树艺”、“纺绩织纤”之人。可

见其信徒多系直接从事劳作的下层群众,尤以手工业者为多。也因此,墨家学说强调物质生产劳动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尚力”),反对满足生存最基本需要之外的消费(“节用”),企图以“普遍的爱止战乱取太平”(“兼爱”),与此同时又尊崇天神(“天志”),主张与统治者合作(“尚同”)。这些思想典型地映现出小生产者和小私有者的文化性格。秦汉之后,曾作为显学的墨家学说逐渐衰落。但是,在近代中国,墨子的思想曾一度复兴,其经典《墨子》一书也被多家书社刊印。

道家学派的始祖是老子。相传老子曾做过周王室史官,他还曾和孔子讨论过“周礼”。但面对着礼崩乐坏的争霸局面,他与孔子的积极有为精神相反,主张无为而治。在他看来,“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而自然是无为的。为此他创立了崇尚自然和无为之学的道家。与孟子大约同时代的庄子则进一步发挥了老子的这一自然无为思想,并在自己的人生活动中处处遵循这种无为逍遥的生存方式。《史记》中就曾记载有庄子拒聘为相的故事。后人将此学派的思想统称“老庄之学”,其经典是《老子》和《庄子》(道教称《道德经》和《南华经》)。

除了儒、墨、道三家之外,兵家、名家、法家、阴阳家、农家在当时也非常有影响。

兵家的代表人物是孙武子^①。孙武子是春秋末期齐国人,这位与孔子同时期的古代杰出军事家留下的《孙子》一书被奉为“兵家圣典”。据《史记》记载,他从齐国出走投奔到南方的楚国,经吴王重臣伍子胥的推荐,吴王阖闾知他善于用兵,便重用他为将。他同伍子胥辅助吴王经国治军,对于吴国的崛起,“西破强楚,入郢,

^① 中国历史上还有一位兵家的代表人物——孙臆。这位战国时期的杰出军事家也被史家尊称为孙子,而且他也有《兵法》流传后世。所以,有时为了予以区分二位孙子,人们习惯于称春秋时的孙子为孙武子。但是,更多的时候孙子就是指称的孙武子。

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

名家的代表人物是惠施与公孙龙。名家好辩，当时被称为辩者。惠施与庄子不仅交往甚多，而且有过许多著名的辩论。《庄子》一书中保存了惠施“合同异”等一些著名的命题。公孙龙的著名命题则有“离坚白”、“白马非马”等。名家的好辩往往因为混淆名与实、一般与个别的区别而流于诡辩，但其辩证思维的思想对于启迪后人的智慧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法家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李悝、商鞅、申不害、慎到、韩非子等。李悝著《法经》，商鞅实行“法治”，申不害、慎到则相继提出重“术”、重“势”的思想，到韩非子集法(政令)、术(策略)、势(权势)之大成，建构成完备的法家理论。史书记载，秦王嬴政读《韩非子》一书，竟至废寝忘食的程度。法家也是战国时期的“显学”，后来成为秦王朝统治天下的政治理论。汉代以后，虽然儒学独尊，但法家学说仍或隐或显地发挥着作用。

以邹衍为重要代表人物的阴阳家，其特点是“深观阴阳消息”。所谓阴阳消息，即阴盛则阳衰、阳盛则阴衰的变易之道。阴阳家认为阴阳的矛盾双方互为消长，一生一灭，构成自然界与社会万事万物运动发展的终极原因和基本方式。运用阴阳消长模式来论证社会人事是阴阳家的一大创造，而从时间、空间的流转变化中去把握世界则是阴阳家别具特色的思维方式。

与孟子同时代的楚国人许行则是农家的代表，其学说只散见于《孟子·滕文公上》等篇中。他主张统治者应与民同耕、同食。这种平均主义的农民意识对中国古代历史的影响也极为深远。

除了上述诸子学说之外，以张仪、苏秦为代表的纵横家，主张合纵连横，由于其直接为君主权术作论证，故其思想对后世影响不大。而“兼儒道，合名法”的杂家则主要是折衷糅合了诸家学说，故也无太大的影响力。小说家则被认为是记录“街谈巷语”的小道而不被看重。由此可见，真正构成百家争鸣核心的是儒、道、法、墨诸

家,这些思想作为一种文化传统对尔后的中国历史产生了极为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诸子经典作为对这一文化传承的一个载体也因此在中国历史上倍受瞩目。

二、传统经典文化的基本思想

中国古代的传统经典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在它的长期发展过程中,由于思想家们的概括提炼,逐渐形成了一系列优秀的具有鲜明的中国文化特质的理性原则、价值观念和审美旨趣,它对于中国社会的文明进步,对于中华民族的成长壮大,有着不可替代的促进作用。因而,对中国传统经典文化所承载的思想观念以及衍生的民族精神作一概况式的梳理,无疑构成我们领会和发掘经典文化的智慧,从而弘扬民族精神的基本前提。

从最基本的层面审视,我们也许可以说,传统经典文化所体现的理性原则、价值观念和审美旨趣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传统经典文化特别推崇天人和谐的思想。中西文化的基本差异之一就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中国文化比较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而西方文化则强调人要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才能求得自己的生存和发展。诚然,中国古代如荀子也有过“明于天人之分”和“人能胜乎天”(《荀子·天论》)的思想,但这种思想并未占主导地位。中国古代思想家一般都反对把天和人割裂、对立起来的观念与做法,而是竭力主张天人协调,天人合一。在先哲们看来,天与人、天道与人道、天理与人性是同类相通的,因而完全可以达到天人和谐统一的境界。

按照中国哲学史家张岱年先生的划分,在天人关系问题上中国古代思想家主要有三种学说:^①一是道家的“任自然”之说,即庄子认为的“不以人助天”(《庄子·大宗师》);二是荀子的改造自然之

^① 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81页。

说,“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天论》);三是儒家的“辅相天地”之说,“天地交泰,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易传》)。由于儒道互补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导方面,因而道家和儒家对天人关系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这就是强调天人和谐。道家称“法天”、“忘己入天”,儒家称“畏天”、“天人合一”。作为儒家经典的《易传》对天人和谐的基本内涵曾作了如下的概括:“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时,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弗违,后天而奉天时。”这亦即是说,人应遵循不违天的天人和谐原则。

显然,中国传统经典文化把人生处世的理想目标立为“天人和谐”,其积极意义是明显的。近代西方尤其是16世纪开始发展起来的自然观,在“人定胜天”、“征服自然”等戡天思想的支配下,一方面取得了巨大的物质文明成就,但另一方面,随着工业文明的发达,生态平衡、环境污染、能源危机等令人忧虑的社会问题迭起,这无疑是破坏“天人和谐”的结果。也因此,当代西方许多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和谐”、“天人合一”的思想开始表现出极大的关注和向往。所以,汤因比甚至断言:人类未来的文明如果不以此作为范式的话,人类的前途将是可悲的。

其二,中国传统经典文化主张以德性修养为安身立命之本。在中华民族传统的立命观念中,最注重的是个人的自我德性修养。而儒家的自我修养理论,其影响则最为深远。在孔子看来,要变“天下无道”为“天下有道”,就要求志士仁人在德性修养方面达到仁、智、勇的“三达德”境界。一旦一个人达到了这一德性修养的境界,就能做到“知(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论语·子罕》)。孔子自己的人生实践无疑就是孜孜追求这一德性充实于内心的一生。

朱熹提出了“居敬察省”的德性修养理论,可以说是古代修养理论的集大成。所谓居敬,就是念念之间存一个郑重而不苟且的

态度,对人、对事、对学问、对根本的义理,都郑重其事;所谓察省就是做到时时反省检查自己。正是鉴于德性修养对于一个人安身立命的重要性,他把《礼记》中的一篇《大学》单独抽取出来,列为“四书”之首。而《大学》之所以如此被看重,原因就在于它强调了自我修养的八个步骤,并以天下太平和谐为其终极目的。这一修养功夫最初的两个步骤是诚意、正心,这说的是立志;其次两个步骤是格物、致知,目的在于了解世界;接下来的一个步骤是前面四个步骤的总括,即修身,其目的在于使自身变得完美,以便使自己能担负起社会历史责任;最后三个步骤是齐家、治国、平天下,其目的是实践自己的德行,在治国安邦的社会活动中实现一个人最终的生命价值。在古代中国,《大学》是每个文化人接触的第一本经典,具有发凡启蒙和确定人生宗旨的作用。可以说,后来整个中国文化关于修养方面的论述无一不是以它为主导的。

中国传统修养理论讲诚意、正心、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中心环节是修身。因为诚意、正心、格物、致知是功夫,目的是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修身的必然结果,身修好了,自然就会家齐、国治、天下太平。所以说,修身是立身之道,也是立国之道。传统经典文化中的德性修养理论,强调了个人道德修养对社会生活的重要作用,这显然是非常合理的。这一德性修养传统的积极结果是在历史上造就了无数个像范仲淹那样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志士仁人,他们身上所体现的崇高德性已成为我们民族的道德人格追求。民族精神中的这一道德人格对中华民族的历史与现实显然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其三,中国传统经典文化也以中庸为基本处世之道。中庸之道作为儒家最推崇的为人处世之道,一直贯穿于整个中国古代的传统观念之中。按照孔子以及后世儒家的解释,“中庸”的“中”,有中正、中和、不偏不倚等含义;“庸”字是“用”的意思,“中庸”即“中

用”之意。所以，中庸意即把两个极端统一起来，采取适度的中间立场，既不能过，也不能不及。

从历史上看，中正平和的思想在孔子之前就有人提倡了。尧在让位于舜时就强调治理社会要公正、执中。《周易》中也体现了“尚中”的观点。所以，它的中爻的爻辞大多是吉利的，亦即是说只要不走极端是不太会有不利的局面出现的。春秋时期，中正平和的思想进一步扩展到其他领域。如晏子就认为，食物、色彩、声音等，以能使人们心平德和为善。

孔子及以后的儒者则在上述基础上，对中庸思想作了广泛的发挥：在政治上，依照中庸之道的原则，既不能一味宽容、宽厚，采取无为的态度，也不能使政策过于刚猛，刑罚过重，二者要相互协调，相互补充，以中和的态度处理政治问题。在经济上，依照中庸之道的原则，要给予百姓实惠，但不能浪费；要使百姓勤于劳作，但不能过度压榨，使他们产生怨恨；要允许各种欲望得到满足，但不能鼓励贪婪，没有限度。在伦理道德上，中庸更是被视为最高的道德原则。只有遵循中庸原则的人，才能成为君子；行为过激的人，只能被看作是小人。如孔子就曾评论他的两个学生说，子张放肆过了头，子夏则过于拘谨，他们都没有做到中庸。在日常行为方面，依中庸之道看来，做事只考虑实际的质朴以致忽视了文采，就会显得粗野；而只考虑外表的文采以致忽视了质朴，又会显得虚浮。在处世态度方面，主观、武断而不留余地，自我中心和固执己见都不符合中庸之道。在审美欣赏上，依照中庸之道的原则，可以追求美的享受，但不能沉溺于其中；可以有各种忧思悲哀，但要适度，不能伤害身体，如此等等。

中庸之道还被后世儒家进一步概括为世界的普遍规律，认为它不但体现了事物发展的运行规律，也构成人们实践所必须遵循的普遍原则。所以，中庸之道成为社会教化的重要内容，被视为是做人所必须达到的一种境界。《礼记·中庸》把这种境界称为“极高

明而道中庸”。至于如何达到这一境界,《中庸》认为有五个步骤:“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一思想对我国古代知识分子安身立命与为人处事的实践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在民族精神中,作为一种根本的处世之道,中庸之道使人们普遍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态度要适度,从而避免过激行为的出现,这使得中国社会有着某种特殊的稳定性,这是它积极的一面。但另一方面,它也为折衷主义、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提供了理论土壤。这又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会的向前发展。显然,这是我们把握这一文化特征时所必须注意的。

其四,中国传统经典文化还强调以义利合一为基本价值追求。追求义利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与民族精神中基本的价值命题,它是在古代思想家们漫长的义利之辩的争论中逐步形成的。这里所说的“义”是指道义,而“利”则指利益,一般多指物质利益。从先秦开始,中国古代思想家们就纷纷对义与利的关系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主张重义轻利。如孔子就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孔子虽然并没有否定“利”,但他反对见利忘义,主张君子要“义以为上”、“见利思义”。孟子继承了孔子的思想,但更强调义与利的对峙。他说“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孟子·梁惠王上》),并以“为利”还是“为义”作为区别小人与君子的唯一价值标准。荀子则认为任何人不可能不考虑个人利益,然而应该使个人利益的考虑服从道义原则的指导。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所以荀子认为虽尧舜不能排除民之欲利,虽桀纣不能去民之好义。因此,荀子认为处理义利关系的基本原则是“见利思义”。这与孔子的思想也是基本一致的,只不过他更承认人有好利之心这一基本事实。

到了汉代,董仲舒提出了“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汉书·董仲舒传》)的著名命题,以尚义反利的观点片面发展了先秦儒家的重义轻利的价值观。所以,后来清初的启蒙学者颜元针锋

相对地提出“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四书正误》）的相反命题。他认为“义中之利君子所贵也”，把义与利相互结合起来。可见，颜元在古代思想史上第一次对董仲舒以来的道义论价值观作了可贵的纠正。

当然，在义利统一问题上，中国传统经典文化由于正统儒家思想一直占主导地位，所以重义轻利甚至是尚义反利的思想也一直是一个传统。这一传统一方面维持了中国古代社会的稳定和延续，塑造了中国人以道德为上，重气节、重人格的民族性格；另一方面，也有压抑人的物质欲望，扭曲人性的弊端。对于中国传统价值观中的这一“反利”传统，无疑又是我们今天所应该批判和否定的。

其五，中国传统经典文化的发展，还形成了以经学为治学之根本的学术道统。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经学成为一以贯之的学术之根本。“经”本来是孔子所整理的上古文化典籍，总称为“六经”，即《周易》、《尚书》、《诗经》、《礼》、《乐》、《春秋》。它包括了古代的政治、历史、哲学、文学、音乐、典章制度等丰富的文化内容。孔子去世后，儒家分为许多流派，但这些不同派别的思想家对“六经”都非常重视。如荀子在《劝学》篇中就认为，做学问“始乎诵经，终乎读礼”。也许正因为这一缘故，荀子被认为是“经学”的最初倡导者。到了汉代，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经”的地位也因此而大大提高。研究“六经”及儒家经典的学问被称作“经学”，是当时学术文化领域中压倒一切的学问。“经”也不断扩充与增加，到宋朝时已扩充为“十三经”，《论语》、《孟子》，以及阅读古代经书的语言文字工具书《尔雅》等都包括在内，成为一切学术文化之根本。

因此，在我国古代，“经”具有不可更改和不容怀疑的权威性。西汉王朝推行“以经取士”的选官制度，更是引导读书人只从“经”处做学问。此后，传授经典和注解经典都成为了专门的学问，并逐步形成了自汉代至清代的官方哲学——“经学”。

而且,作为一切文化学术的指导性经典,这些“经”常常被刻在石碑上,以显示其权威性。据史籍记载,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七次大规模的刻经运动。如今在西安碑林博物馆内,还完整地保存着唐代的“开成石经”。除刻经外,历代对“十三经”的注疏、训解、发挥,更是层出不穷。仅据清代乾隆年间的《四库全书总目》记载,“经部”的著作就有 1773 部,20427 卷。可以说,在汉代以后,经学的发展取得了驾驭和主导一切学术文化领域的至高无上的地位。

事实上,经学是一门内容涉及广泛的学科,即就“六经”而言,就已经包含了人文科学及某些自然科学。孔子就曾说过,读《诗经》,甚至可以增加对鸟兽虫鱼草木之名的博物知识。因此,经学本身并不排斥自然科学,相反,儒家经学中的理性主义以及某些思辨方法,对自然科学甚至还有启迪意义。但问题的关键是,经学以它自成一套的体系,凌驾于一切知识之上,无形之中就排斥了科学的独立性。这对古代自然科学的发展显然又是不利的。它至少是明清以后中国科学技术落后的一个重要文化根源。

重要的还在于,以 1840 年鸦片战争为标志,中国社会开始由古代向近、现代转型。在这个充满危机与痛苦的转型过程中,人们对待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产生了诸多的偏激情绪。在西学如潮水般涌进中国的历史条件下,20 世纪 20-30 年代发端至今依然颇有拥戴者的“全盘西化论”正反映了这种偏激情绪。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经学被彻底地否定,作为传统文化的承载体的诸子经典遭受到了空前的冷遇。这当然是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

三、诸子经典智慧的现代发掘

在走过了血与火写就的屈辱的近代历史的今天,在进入充满希望也充满挑战的 21 世纪之后,摆在当代中国面前的根本任务无

疑是尽快实现现代化。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走向 21 世纪的中国文化将是适应现代化建设的新型文化。但这个适应现代化的新型文化决不是无中生有骤然降临的,而一定是与传统文化有着内在的必然的关联性。事实上,从世界上一些已基本完成现代化进程的国家来看,对传统文化现代意义的开掘,并在此基础上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几乎无一例外地成为文化现代化建设的一个必要环节。

以这样的视阈来研究和发掘传统文化经典,我们随即可以发现诸子经典的现代意义是非常值得我们现代人关注的。我们认为,现代人读经的意义在于可以借助于古代经典对“道”的深刻探寻来感悟现代人生的诸多智慧。

当然,我们主张读经决不是走复古主义的老路。而是坚持以现代人生实践为依据,对传统经典进行批判地继承。正是遵循着对传统经典文化批判继承的这一基本原则,我们借助于思维的抽象,可以对中国传统文化经典的思想内容作不同的甄别与归类,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对其现代意义加以开掘:

其一,在发掘经典智慧的过程中,对传统经典文化中的封建糟粕应持彻底批判与摈弃的态度。在传统文化的发展中,一个基本事实是绵延了几千年的封建主义文化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因而对传统文化中具有封建文化性质的观念,以及反映这些观念形态的一切“物化”了的种种事物,我们必须持彻底的批判态度。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在道德伦理、秩序制度、价值观念、风俗习惯、民族心理、思维方式等等方面,封建主义影响的痕迹几乎随处可见:大如专制制度、等级观念、宗法思想、人治传统之类,小如待人接物的礼教规矩和为人处世的“不敢为天下先”的保守原则等等。对于这些传统文化中遗留于现实社会的沉渣和糟粕,应当坚决予以抛弃。此外,还有一些虽然不为封建文化所独有,但反映了一般农业文明的局限的东西,诸如重农轻商的观念,狭隘短浅的目光,